

ZHONGGUOSHEHUIZHUYI
JINGJISIXIANG DASHIJI

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大事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大事记

李发胜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 字数54万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定价: 9.80元

ISBN 7-210-00698-2/F·56

前 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逐渐产生、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它由介绍、宣传，到照搬、探讨，再到当作“棍棒”乱舞，直至今日的全面求索，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不乏有宝贵的思想和很好的经验，也有一些荒唐的歪理和深刻的教训，但至今没有一本系统记述其历程的书。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总结，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填补我国理论上的这一空白，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特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大事记》一书，力图“原始地”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程。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紧密相联的，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指导这一革命和建设思想指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也是我们的革命史和建设史，因此，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发展的推进过程是完全吻合的。根据初步的大致划分，它可分为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开始全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转折和开创六个大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它又经历了一些小的曲折，而又显示出不同的阶段。作为每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都深

深地打上了每个特定时期的烙印，深刻地反映了每个不同时期的特点。

（一）启蒙时期

启蒙时期，也就是中国人开始谈论马克思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从时间上讲可以从第一个在中国的报刊上谈到马克思的1899年算起，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止。

在中国的报刊上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刊登在（由美国人创办并主编的）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的第121—124册上的，英国人企德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的《大同书》一文，文中两处提到马克思，一处提到了《资本论》。中国人谈论马克思最早的是改良派的头目梁启超。他在1902年刊登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署名为“中国之新民”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和1903年的《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上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以上是在中国最早谈论马克思的时间。

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1903年，上海改良派的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经济学之评论》、《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该书的第二编，专门介绍了“德意志社会主义”，第一章就是马克思传及马克思主义学说。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直至1917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许多社会主义革命者加入了这一行列，如李大钊等。

启蒙时期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谈论马克思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基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主要是一些改良派

的头目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是与当时中国的客观历史条件及时代特点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少，力量薄、文化水平低，作为一支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情。在当时，只有这些人才有可能接触到来自海外的“洋思想”。

其二是，他们谈论马克思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在中国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种人，谈论马克思，是为了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是失败的，其制度是不可取的，从而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如改良派的头目梁启超就是如此。另一种人，想在中国建立他的社会主义，但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如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们不反对社会主义，认为实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还幻想实行以土地国有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就可以防止在中国发生资本主义。

启蒙时期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在客观上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该时期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本身提出什么创见，而只是单纯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由于介绍者的立场局限性，或没有弄懂等原因，这种介绍基本上是零散的，还存在不准确性，甚至还有歪曲之处。

（二）新民主主义时期

新民主主义时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启发人民觉悟，为建立社会主义而奋斗，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时代。从时间上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

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949年止。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分为传播、宣传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产生、确立的阶段。

传播、宣传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阶段是启蒙时期介绍、传播的继续和发展，但又与启蒙时期的介绍、传播存在质的差别。具体表现为1、传播、宣传的目的不一样。这一阶段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经济学理论，是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为建立社会主义中国而鼓与呼。

2、这个阶段是结合中国实践来宣传社会主义。许多革命者，我们党的早期领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证明、号召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3、这个阶段的传播、宣传的系统性、准确性。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一批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个阶段虽然是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还不是系统地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在传播和宣传中包含了中国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等的理解，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的后阶段，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萌芽，到表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为形式的，早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确立阶段。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论述的道路，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践，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样一来，一进入革命的实践，就在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逐渐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当然，在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中是走过了曲折的道

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主要包括，关于旧中国经济制度的性质以及经济结构的理论；关于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的理论等。这一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思想的特点，一是具有宣传性、批判性和实践性，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构画在中国将要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轮廓，研究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探讨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的形式。这时期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了萌芽和取得了初步实质性的内容；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贡献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

（三）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来看，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转化阶段。从时间上讲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止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这个时期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况相应，分为恢复和三大改造两个阶段。

恢复阶段，主要是为解决战争带来的创伤，稳定经济，恢复生产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与前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不同的是，它具有过渡性、临时性。从经济达到稳定、恢复以后，就转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改造”阶段。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稳定物价、恢复生产、保障生活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与阐释；对过渡时期经济规律和经济结构的认识和论

述；关于农业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转移的认识与讨论等。

变革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点。既然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主要表现为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目的的“转化”，加之当时在经济方面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全面地大规模地组织和展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此相应，此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自然地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了变革生产关系方面。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不少值得一树的理论，如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主题”，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观点，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理论；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和建设思想等，这些不仅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占有光彩夺目的一页，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很大贡献。

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已具有急于求成，求大求纯的思想隐病。造成这一隐病，一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是缺乏经验的结果。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局限性，不可能认识到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具有独创性、成功性，但也有需要重新认识的方面。要是当时能认识到初级阶段的特点，就会有更加丰富、更加光芒四射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

（四）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期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期，是指初步地全面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阶段。从时间上讲，始于完成“三大改造”后的1957年，止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5年。这一时期随着政治形式的频繁变化，经济理论研究也就存在颇多的转折，而呈现不同的小阶段。先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带来的求学阶段，不久又进入了“反右”、“大跃进”的“盲目”阶段，最后被迫进入了“调整”阶段。

尽管这一时期出现多次的波折，受过极“左”思想的冲击，但它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这一时间研究的问题较多，内容极为丰富，其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研究的一些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一些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综合平衡和计划规律研究的思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思路等。

这一时期提出了许多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毛泽东同志在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所精辟论述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农轻重关系，统筹兼顾等思想；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提出的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的理论，并发展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理论，承认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观点等。2、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的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作用的观点；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以及三大平衡的观点；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3、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思想。4、黄松龄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质的规定性的观点。

5、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等等。这些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一时期的特点有二。一是理论研究转折颇多，观点反复频繁。这是由于这一时期，政治形势频繁变化所致。在这期间政治形势多则三、四年，少则一、二年即发生一次变化，政治形势的变化又过多地干预了理论研究，致使经济思想研究也不断相应地出现转折。乘1956年的大好形势，1957年经济理论界一度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但随之而来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严重破坏了这一大好形势，使喧嚣沸腾的局面变得沉闷。1958年大跃进的鼓声，人民公社的红旗，使政治形势令人头晕目眩地高涨，挟持着理论界在不同程度上陷入盲目性，使“左”倾思潮抬头，理论研究也沾上了形而上学色彩。当经济建设遭受破坏和损失的现实，使理论界认识到“左”倾思潮的错误，纷纷起来抨击错误思潮，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的时候，庐山会议又风云突变，转批“左”为反右倾，压制和影响了科学的讨论。随后几年，我党接受了错误的教训，重视了经济建设和经济效果，经济理论界也相应出现了大好形势。这时的经济理论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逐成系统，纳入规范。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展开又使“左倾”思想抬头，并逐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最终使理论研究受到严重干扰，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走向波谷。

二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逐步形成系统，纳入规范。前期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显浮浅，对问题探讨的范围尚受局限，同时探讨的问题也显散乱。在这一时期，理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它在不断反复的政治形势中得到锻炼并不断发

展，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断由比较浮浅、散乱，发展为比较深入，逐步形成系统，纳入规范。这一时期中，理论界开始试图借鉴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创建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尝试虽显稚嫩，却形成发端。此外，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和社会再生产等重要理论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系统研究。研究的方法、程式等也逐步规范。

总之，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它不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同时，它也造就了一批和一代经济理论工作者，既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又提供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理论骨干。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十年动乱时期，时间为1966年至1976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到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的研究被唯心主义的说教所排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被“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所代替，它几乎丧失了科学性，打上了深深的“神学”和“辩护学”的印记。在“棍、棒”乱舞，恐怖笼罩着经济学界的年代中，经济理论研究步入了死胡同，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阶段。

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被从“左”的方面推到了极端，它是服务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推行“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论。2、在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鼓吹“穷过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纲举目张”的理论。3、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未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虽不占统治地位，但它们都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基础。为此，要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在分配上推行平均主义，在物质利益上，否认个人利益等办法加以限制。4、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条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5、“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大而全、小而全”和“大干快上”为特征的国民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6、以反对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主张闭关锁国为特点的对外经济理论，等等。

当然，还应该看到，在这一非常时期，还有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工作的人，利用一切可以讲话的机会反复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性，提倡或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争将四个现代化列入党和国家的大事之中；有的利用重新工作的机会，提出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整顿等政策；有的在撰文论述其他问题时，借题发挥而阐明一些正确的经济思想；有的甚至蹲在牢房和牛棚之中构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主体思想的错误而忽视科学思想的存在。

这个时期经济思想的特点是，一是具有非科学性。这种非科学性首先表现在这些理论出台的依据和判断标准是不科学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种经济理论的产生应该根源于生动的社会经济实践，并应该用实践来衡量、检验其科学性。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经济理论的出台统统都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依据，并以“最高指示”为衡量一

切理论观点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这样，以注释毛主席指示为己任的经济理论，就成了一种“教义”，变成了神学，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与观点。任何理论，如果一旦被“神学”化了，丧失了实践的依据与标准，那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性。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收入的大量文献资料中看出，那些许多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从今天看来是十分荒谬的经济理论观点，在那个时期都堂而皇之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存在过。这在后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这种非科学性还表现这个时期的经济理论的空想性。这个时期的理论远远离开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离开了实际，自然就使得这些理论成为荒谬的“空想”了。凭先天的原则来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超越中国当时情况来推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只能是使中国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走进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死胡同。

这个时期经济理论的特点之二是其研究方法充满了唯心主义荒唐与形而上学的怪诞。“文化大革命”期间，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思想路线几乎全部被丢掉了，“天才”的头脑替代了亿万人的复杂思维，伟大的意念成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的“圣旨”。全民族的思维被僵化、凝固，经济理论的研究被纳入模式之中，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走入了歧途，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得不以闹剧开始，而以悲剧结束。

（六）转折和开创时期

转折和开创时期，是指自粉碎“四人帮”后进入的伟大历史转折和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时期。从时间上为从1976年10

月至现在。这个时期又分为三个阶段，即徘徊、调整和开创三个阶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结束了十年动乱，进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阶段，这个阶段对“四人帮”炮制的一系列经济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澄清，使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向正确方面转化；同时，在理论上开始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战略目标。但由于这个阶段思想路线上“左”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仍然信守“两个凡是”的教条，对十年浩劫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经济理论中“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估计不足。虽然在经济思想领域“坚冰已经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正在改变，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正在复苏，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处于徘徊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结束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纠正经济工作指导中的“左”的错误，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不仅提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些理论，而且提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在农业中执行各种经济责任制的理论；同时还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一些试点和探讨，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经验上为全面改革创造了极好的基础。

随着正本清源，恢复经济学的本来科学面目和贯彻“八字方针”的不断进展，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讨已成了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的春天已经来到，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了全面的繁荣，进入了开拓新时代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取得了

辉煌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界主要研究了下列四大方面的理论问题：1、针对“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正本清源的理论研究和批判。2、围绕“八字”方针的贯彻，从经济理论上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乃至包括建国以来“左”的思想的“拨乱反正”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批判。3、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和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宣传。4、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而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和论证。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取得了下列15方面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突破：1、纠正了一系列“左”的错误经济思想，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的许多宝贵思想的本来面目。2、找到了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3、确立了我国目前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了初级阶段的性质、任务、主要矛盾、基本路线和经历的时间。4、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突破了过去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5、肯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多种模式，不能把那些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必须通过全面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突破了在所有制形式上急于求公、求成、求纯的旧观念，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理论。7、突破了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传统观念，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广泛实行承包、租赁等多种经营方式的理论。8、突破了计划与市场相互排斥的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要把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机制的理论。9、破除了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理论。10、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物价固定不变和国家定价的旧观念，明确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的理论。11、突破了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观念的束缚，明确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观念。12、突破了国家直接管理经济活动的传统观念，明确了逐步建立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观念。13、突破了长期闭关自守的旧观念，提出了实行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际经济技术交往与合作的新观念。14、突破了企业是行政机构附属物的传统观念，确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在企业内部全面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通过竞争选拔合格的经营者等新观念。15、拓宽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新兴经济学科，经济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走向多样化，经济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等等。

虽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不用说，这时期本身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传统观念、“左”的束缚不断干扰着它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经济思想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还只是一个起步，它远不能解决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它还带有很浓的解说“官方”政策的色彩，传统观念还没有完全冲破，或说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些都有待于今后逐渐解决。

值得高兴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繁荣发展的高潮已

经来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给创造出伟大的经济理论提供了“土壤”；良好的政治环境给经济思想的发展，扫除了和不断排除着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人类几百年来，在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反的借鉴经验，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对世界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很多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理论中的瑰宝。